

## 去模式化：全球媒介制度比較

沈國麟\*

---

---

書名：*Comparing media systems beyond the western world*

編者：Daniel C. Hallin and Paolo Mancini

出版日期：2012年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出版於 2004 年的《比較媒介制度：媒介與政治的三種模式》（*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如今已經成為比較媒介研究中的一本經典之作。在這本著作中，丹尼爾·哈林（Daniel Hallin）和帕羅·曼其尼（Paolo Mancini），比較了西歐和北美地區 18 個國家的媒介制度，歸納出三種模式：極化多元（Polarized Pluralist），民主統合（Democratic Corporatist）和自由（Liberal）模式。2012 年，在《比較媒介制度》的基礎上，兩位作者編輯出版了《比較媒介制度：西方世界之外》（*Comparing media systems beyond the western world*），邀請了 11 位來自東歐、中東、亞洲非洲和南美的作者分別探討了各自地區的媒介體制。雖然兩位編輯在導引中希望他們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西方媒介模式去魅（Hallin & Mancini, 2012, p.

---

\* 作者沈國麟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講師、博士，e-mail: shenguolin@fudan.edu.cn。

1)，但是參與寫作這本書的大部分作者還是把四個變數—媒介市場結構、政治平行（political parallelism）的程度和形式、記者專業主義和國家的角色（這四個變數是在《比較媒介制度》中提出來的）運用到了自己的分析之中，以此來衡量各自的媒介體制。

其實四個變數不足以概括西方國家之外的媒介制度，因為各個地區歷史條件差別各異。例如，在以色列，「國家安全文化」對媒介制度的型塑有非常重要的影響（Hallin & Mancini, 2012, p. 12）；在巴爾的幹國家中，對民族語言、國家認同和文化傳統的認可和保護在民族覺醒中扮演著工具性的作用，從而深深地影響了媒介制度（Hallin & Mancini, 2012, p. 53）；中國媒介制度具有「並不獨立的商業化」（Chan, 1993）和「無法保障的專業化」（Yu, 1994）等特點，與其他國家大不相同，更勿論用西方世界三種模式來套了—如同趙月枝在本書中指出的，「在中國，雖然黨營媒體模式仍舊『在結構上占主導地位』，但在這個數位化和社會化傳播的時代中，也許我們需要超越一個簡單的模式、在政治工具化、商業工具化、工具主義、專業主義、大眾參與的壓力之間的動力和創造性張力中來理解中國媒介制度」（Hallin & Mancini, 2012, p. 172）。因此，除了拿來度量的四個變數外，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變數，這使得全球性的比較變得尤其複雜，如此則難以形成全球性的模式和理論。更重要的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和地區內，應該衡量這四種不同的變數孰輕孰重，並且找出不同變數之間的張力。

哈林和曼奇尼認為：「比較分析能使我們注意到我們注意不到因此也就沒有概念化的東西，同時也迫使我們釐清概念的範圍和應用（Hallin & Mancini, 2004, p. 3）。但是把西方模式運用於西方以外的世界會照亮其他媒介體制的重要部分，但也會把其他部分留在黑暗裡。比較研究雖然比較的是不同點，但比較物件之間應有一定的相關性。全球

性地比較媒介體制會削弱比較分析的基礎，比較分析的媒介體制越廣泛，其相同點就越少，這樣會減弱比較分析的意義和重要性。

其實，在比較分析之後還有更有價值的工作。在《比較媒介制度：西方世界之外》中的章節所探討的國家和地區中，一些國家經歷了民主轉型，還有一些國家即使仍然維持著他們的威權體制，其也經歷了很大的變化。由於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媒體系統的形成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成爲一個社會構建的過程。轉型和整合的背後有各種各樣的動力，這些動力需要加以辨別和分析。例如，在許多國家中，媒介市場的迅速擴張把媒體變成了市場導向的系統，一方面，把新聞媒體從國家操控中解放出來，增強了新聞專業主義的力量；另一方面，商業化的過程導致了媒體的小報化。媒體產業的首要目標變成了盈利。鑒於許多國家並沒有新聞自治的傳統，「商業氾濫」（commercial deluge; Hallin & Mancini, 2012, p. 19）—新聞業的市場化腐蝕了專業主義。在巴爾的幹國家，「蘇聯時期的自我審查意味著規定自己不要在公開談論特殊話題（除了用伊索寓言式的語言寫就的之外），今天則意味著修正內容以適應一個提倡盈利的特殊環境。」（Hallin & Mancini, 2012, p. 69）在中國，商業化的出現也伴隨著記者權力的濫用以及記者職業道德的腐化。如此看來，考察專業主義和商業化之間的張力變得很有必要。

另一個例子是西方媒介體制如何影響其他國家。在第五章中，阿爾布秋克（Albuquerque）論述了中心媒介體系和邊緣媒介體系的關係。冷戰結束後，許多後共產主義國家開始經歷了一個複雜的結構轉型，從國家媒介體制轉向一個獨立的自由的媒介市場。由於與西歐國家相鄰，以及外國資本的介入，這些國家紛紛開始模仿西方的媒介制度，例如建立公共廣播系統。但二十年的經驗表明，後共產主義國家很難照搬或著有效地重現西方經驗。但西方媒介體制確實在場，西方經驗確實成爲後

共產主義國家媒介體制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理解中心（西方）媒介體制的在場呢？中心媒介體系和邊緣媒介體系之間的互動是如何進行的？不同媒介體系之間是如何混雜和競爭的？背後的動力是什麼？

雖然哈林和曼奇尼當年提出的三種模式是分析式的而非規範式的，但當這三種模式被拿來度量其他地區時，便成為規範性的模式。但這種規範性模式推廣到全世界的時候，其內涵本身就要受到質疑。沃爾特默（Voltmer）在書中提出了「反模式」（anti-models），來指代一個正在顯現的碎片化、細分化以及在世界範圍內缺乏等級的系統，並把三種模式中的媒介市場化、政治平行、專業主義和國家干預這四個變數問題化（Hallin & Mancini, 2012, p. 222）。至今為止，沒有模式可以概括所有的媒介系統。既然媒介系統是在不同的複雜的歷史條件下發展而成的，全球性的比較分析其實構成了「去模式化」（demodelling）的過程，即越是在全球範圍內比較媒介體制，越難用一種或者幾種模式來概括現狀，也就越難提出模式化的理論。

然而，雖然沒有普遍的規範性模式，但在比較分析背後卻存在著規範性的價值。這些價值包括：多樣性、開放性、負責任、獨立、資訊準確、新聞自治以及公共服務導向等等。當辨別三個主要模式時，哈林和曼奇尼問了如下的問題：商業支援還是削弱了媒介的獨立性？在多元社會中聲音的多樣性是否更好地在外在多樣和內在多樣的媒介系統中被代表了一即新聞媒體是否表現了不一樣的政治傾向，或著新聞媒體是否在以一種平衡的方式報導新聞？……」（Hallin & Mancini, 2004, p. 14）。很明顯，這些問題表明了對規範性價值的認可和追求。在《比較媒介制度：在西方世界之外》中，作者們同樣也有價值取向。當多倍克-奧斯特洛斯卡（Dobek-Ostrowska）描述卡欽斯基總統壟斷公共媒體以及全

國報紙 *Rzeczpospolita* 時，她清楚地表明了國家對媒體的干預是對民主的削弱（Hallin & Mancini, 2012, p. 34）；當瓦塔諾娃分析俄羅斯政治傳播時，她指出大眾傳媒作為公民社會和代議制民主的基石之一（Hallin & Mancini, 2012, pp. 131-132）；當趙月枝提供了對中國媒介制度的理解時，她指出了在一黨專制的體系中，與其說是國家干預不如說是國家主導（Hallin & Mancini, 2012, p. 150）。

哈林和曼奇尼聲稱他們的研究方向是理論建構而不是測試假設，但這種努力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作為一本編輯而成的書，很難建構理論或著牢固的理論框架。這本書的成功之處在於在一定程度上為單一的西方媒介模式去魅並給予讀者全球性的視野以及啟發性的思考。50 多年前，西爾伯特等學者（1956）出版了很有影響力的《報刊的四種理論》，用「自由主義」、「社會責任」、「共產主義」和「威權主義」來表述西方甚至全球的媒介體系，但它並沒有抓住西方媒介體系之內的多樣性，更不用說是全球的。《比較媒介制度：在西方世界之外》向我們表明了未來有價值的研究也許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總結出一些中層比較理論，例如從享有較多共同點（如非洲地區或南美地區）、或者有相同動力轉型，並且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有高度相關性（如後蘇聯國家）的國家和地區中抽象出某些中層理論，而並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比較媒介理論。

## 參考文獻

- Chan, J. M. (1993). Commercial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 Trends and tensions of media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J. Cheng & M. Brosseau (Eds.), *China review 1993* (pp. 25.1-25.21). Hong Kong, C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Hallin, D. C., & Paolo, M.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 D. C., & Paolo, M. (Eds.). (2012).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beyond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ebert, F. S., Peterson, T., & Schramm, W. (1956).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Yu, Xu (1994). Professionalization without guarantees: Changes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post-1989 year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53(1-2), 23-41.